

◆ 龚祖培 著

文人 相轻



的现代阐释

WENREN XIANGQING
DE XIANDAI CHANSI



四川大学出版社

——◆ 龚祖培 著 ——

文人相轻

的现代阐释

WENREN XIANGQING
DE XIANDAI CHANSHI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何 静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相轻的现代阐释 / 龚祖培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614-4893-9

I. ①文… II. ①龚…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5787 号

书名 文人相轻的现代阐释

著 者 龚祖培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893-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引 言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见发生这一现象的年代久远，而且其生命力似乎特别顽强，还没有衰老的迹象。它的遗传基因，包括家族血缘的和社会文化的，一直影响到现代。文人相轻，于今亦然。我所看到的最新版本的文人相轻，正是本书即将脱稿之时，中国中央电视台 2010 年春节联欢晚会演播之后，上海作家韩寒在博客中奚落刘谦表演的魔术为“小品”，并调侃说：“刘谦带了一个诈骗团伙来，演了一出活剧。”刘谦在此刺激之下，以不逊色的排比语言反唇相讥：“我以为您不是会因为某些道听途说，就妄下判断的人；我以为您不是会只了解一些粗浅魔术原理，就大方炫耀的人……”韩、刘是年轻的作家和魔术师，所谓文学艺术中人，自然可称为文人。他们以语言为媒介传递心声，符合文人的思维表达方式。大概心性所使，或许有文人相轻之意。由此事又让人想起数年前北京某知名作家批评金庸，嘲讽式的挑战之后，换来的竟是金庸的沉默无语。大概金庸虚怀若谷，不愿意卷进“不道德”的论辩之中。两事可资比较，让人思考一些问题。

文人相轻为何多发生在年轻之时？文人相轻是不是都不道德？中国人把德行放在修养、处世第一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文人相轻从古到今不断绝？文人相轻的刺激之后能否促进文学创作？对文学评论有无意义？它究竟有哪些负面的影响？有无积极意义？这些疑问都是本书试图解答的，尽管有一些最终也解答不了。

受条件限制，本书只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人相轻现象，研究它与文学的关系，与人格、道德、心理、社会等问题的联系，探讨它对道德的影响。没有做不同民族、不同国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只

是从现代阐释的角度借用了一些西方和东方的学术观点。

中国古代的文人相轻现象十分普遍。被儒家的“道德”眼光过滤之后，它就变成了不齿的另类，于是丰富而且还很精彩的内容似乎被囚禁了，变得黯然而没有色彩。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的经典论述留下的“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只有一点点信息。曹丕所处的时代并非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时，但他的价值判断却十分清楚，文人相轻是令人排斥的不道德的行为，似乎这一问题的性质就此被“钦定”了。一个不小的问题，本该进行科学的透视，研究其方方面面，然而被鄙夷地一挥而去，挥到了边缘冷落之处。从此以后，历代的作家、诗人、学者等，似乎都被道德的沉重的集体记忆控制，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未对文人相轻的问题加以反思。即使清代博学而且颇有识见的学者赵翼，已经有文人相轻可以“相励”的认知，却仍然不能挣脱传统的束缚，在其名著《陔余丛考》中也以“陋习”统观文人相轻。

时至今日，就我所见，还没有一部专著对文人相轻的问题进行研究，只有极少的独具只眼的零星认识，认为对文人相轻应该辩证分析，其中有值得注意、值得肯定的有意义的内涵。马茂元先生曾于上世纪80年代撰文，考证“初唐四杰”的杨炯“耻居王后，愧在卢前”时，才有一段连类而及的论说：“殊不知封建文人之相轻，其所轻者，往往即为其所极端重视之人。瑜、亮一时，相轻与相誉，言各有宜，义相反而实相成也。”恐怕这才有了点辩证分析的味道，好像阴暗的牢笼之中透进了一丝亮光。但那是在《文史》第八辑《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那一类文章中说的话，根本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专论。

我对这一问题感兴趣是从千禧之年开始的，迄今整整十年。研究工作时断时续，如今总算凑合成了一本“专著”。尽管薄薄的一册，似乎与研究的问题不相称，有些寒伧，但还是有沾沾自喜的成就感，因为这或许就是填补空白之作，即使其学术价值或许仅在这

“填补”之中，也自感欣慰。当年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名著也是薄薄的一册；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也是薄薄的一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等也是薄薄的一册，但他很自负地说：“如果从外表上拿本书和通常讨论美学的大部头著作比较，本书也许是很单薄。但是它并不单薄，如果我们看出那些大部头著作十分之九都是些不相干的材料，例如假充审美概念的心理学或形而上学的定义（雄伟的、戏剧的、悲剧的、诙谐的之类），关于所谓美学的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的叙述，以及用审美方式评判过的普通历史；具体的艺术史与文学史也整部地拉进美学里来，而且通常是割裂过的；它们备载对于荷马和但丁，阿理奥斯托和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罗西尼、密开兰琪罗和拉斐尔的评判。”（朱光潜译本）拙著当然不敢望尘、比肩，与他们的著作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我只是有取法乎上的心理而已。打个比方，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是粗放式的开荒，精耕细作肯定只有以待大方之家。或许某些看法能给人以启发和思考，提供学术研究的帮助，因此我并不因薄薄的一册而失去自信。

书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有的根本不是我的学问和能力所能解决的。让我清醒认识到的主要问题有五个：一是缺乏前人著作的参考，尤其是前人的理性、科学的论断的参考。至于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包括著作的体例方面的借鉴都付之阙如，新起炉灶的确增加了很多困难，必然留下某些遗憾。二是文人相轻的现象尽管普遍，但要搜集到足以论述问题的资料却并非易事，因为仅靠基本的古代典籍是不能满足愿望的，必须扩展到笔记杂著等较为偏僻的文献之中去，然而有时读完一书还是一无所获。故有些章节的论据或许有所缺陷。三是即使有了足够的资料，如何分析、综合，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也是困难的。这一问题是跨学科的研究，涉及的现代知识很多，试图将其放在文化视野之下考察，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考察，对文人的心理结构、认知模式、性情气质、人格才性等的关

联，实在难以驾驭，即使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也难以完全找到答案。影响其文化心理的因素，比如文人相轻发生的原因复杂，或许有先天就存在的人的秉性方面的东西，嫉妒心理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除非这些有了科学的结论，否则很难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所以，书中缺乏科学支持的结论恐怕也是存在的。四是我的理论修养先天不足，于是引证、论述时便捉襟见肘，自感窘迫，难免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甚至错乱牵缠，言不及义。本来可以深入下去的地方，往往又突然停住了，或者不该引申之处，又枝蔓啰嗦。如果换一个理论修养深的研究者做这一份工作，那么肯定会有旗帜易色的精彩论断。五是我力求用丰富的资料说话，但又担心论点和论据失去平衡，可能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不能统一。

我还要向留意、阅读本书的人说明几个问题：

一、本书不是“史”著，如“文人相轻史”一类，因此难免有材料的遗漏、论述的缺失，但书中有从先秦到清代的文人相轻特点的比较，目的是突出各个历史时期的同异，显示其不同的特质。宋代文人相轻就与其他时期有突出的不同，文人之间似乎只剩下调侃戏谑、攻击、诋毁性的表达激烈情感的现象很少。另外，明清两代是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按理说应该是文人相轻发生较少的时期，然而事实却相反，较之频繁发生的以前某些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什么原因？或许与西学东渐有一定的关系，也可能和文人的个性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关，尤其是与人欲的膨胀有关。不过这仅是推测，有些问题我实在困惑不能解。

二、书中的论述集中在诗文方面，原因是我对戏剧、小说的研究较少；另外，涉及诗文的文人相轻很多，而戏剧、小说却较少。还有一个原因是戏剧、小说篇幅长，不是文人相轻的刺激之下能迅速完成的，即使有因相轻的刺激而创作的例子，分析、论述其创作过程也很困难，于是我放弃了对它们的深入研究，讨论时基本没有涉及。不过并不是说创作戏剧和小说的文人就没有傲视他人的性情，没有彼此相轻的现象。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说明。汤显祖的戏

剧创作众人皆知。他也是一个颇有傲气的人，因此也少不了文人相轻之事。他的戏曲也有过和苏轼词“雷大使舞”一样被人讥讽，认为不合音律，非当行本色的遭遇。其《牡丹亭》就被当时剧坛盟主沈璟信手涂改了。在沈璟看来，汤显祖不过是一个颇有才气但还未拘驯的小孩，应该让他顺着正道走。于是就把《牡丹亭》不合唱腔之处做了处理。当汤显祖从吕玉绳手中接到修改后的《牡丹亭》时，不禁气冲牛斗，他根本瞧不起什么剧坛盟主，因为那盟主虽然写了许多剧本，也称得上技法老辣，但却过于循规蹈矩，如同王骥德《曲律》所说的那样，沈璟“如老教师登场，板眼场步，略无破绽，然不能使人喝采”。不能使人喝采还叫什么戏剧？还配做盟主指手画脚么？汤显祖仗着文人的血气和激情，一脸严肃地告诉表演的艺人们：“《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汤显祖借吕说话，其实是指斥沈璟。针对时人奉为金科玉律的沈璟编著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等理论著作，汤显祖笑其迂腐。他给吕姜山的回信说：“寄吴中曲论（指沈璟的《唱曲当知》等）良是。‘唱曲当知，作曲不尽当知也’，此语大可轩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他又在给孙如法的回信中说：“曲谱诸刻，其论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庄子云：‘彼乌知礼意。’此亦安知曲意哉……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仅凭“拗折天下人嗓子”的豪气，汤显祖不仅可以藐视沈璟，而且可以当仁不让作“东方曲坛伟人”（青木正儿语）。汤显祖不仅瞧不起沈璟，对当时诗文领袖也颇为鄙视。他瞧不起那些亦步亦趋学古之人，自认为“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李梦阳、王世贞、李攀龙等，都曾遭其讥评。他觉得他们的复古文章“等同赝文”。后来，王世贞死了，汤显祖也老了，才气和锐气都被暮气盖住了，他才带着一点

忏悔之意给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骐写回信道：“弟少年无识，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文不成，不失类鹜；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于敝乡帅膳郎舍论李献吉，于历城赵仪郎舍论李于鳞，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然其大致，未能深论文心之一二。而已有传于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弟闻之，恍然曰：‘王公大人，吾愧之矣。’”（以上引文多出自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或许王世贞真有些先见之明，沈璟不就是涂改汤显祖剧本的人吗？另一个戏剧名家也有所关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附录一说：“高则诚《琵琶记》，其意欲以讥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照此说，那么《琵琶记》也是文人相轻之作，而让蔡邕的道德声名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竟是文人相轻作祟。小说作家也脱不了干系。曹雪芹虽以小说《红楼梦》名世，然其诗文涵养及写作水平，恐怕古今文人很多都望尘莫及。曹雪芹也是以狂傲性情著称的。尽管其生平资料的盲点太多，但他景仰庄子和阮籍，与他们的性情投合是确定的。曹雪芹字梦阮，如同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而起名，章炳麟仰顾炎武之人格、才学而称太炎一样，一字一语均可见意。刘梦溪先生说：“雪芹和敦氏兄弟都很欣赏魏晋文士的风格，尤其推崇阮籍。”即使迁居北京西郊之后生活境况穷困，“但他人穷志坚，傲骨不变”。敦诚的诗句有“懒过嵇中散，狂于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的诗句有“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傲骨嶙峋的人，留下一点小瞧别的文人的轶事不足为奇，何况曹雪芹的才学又那样高，如敦敏形容的“野鹤在鸡群”，大概野鹤太清高，不屑下视鸡群，所以没有讥讽他人的记载（参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曹雪芹》）。《儒林外史》是讽刺之书，金和的《跋》就说其中的人物匡超人是讥讽狂士汪中的。汪中留下了不少文人相轻的轶事，那么这就是吴敬梓对他的“相轻”了。古代的文言小说也可

寻其例。鲁迅先生评唐传奇《白猿传》说：“纥后为陈武帝所杀，他的儿子欧阳询，在唐初很有名望，而貌像猕猴，忌者因此作传；后来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可见那时也就流行了。”《白猿传》作者无名氏，或许是因妒忌欧阳询而作，有所顾忌，所以才故意隐去了姓名。卞孝萱先生考证该小说是褚遂良手下的文人攻击欧阳询而作的（《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这也可能与文人相轻有关联。其他的戏剧、小说作家的性情与文人相轻之事，大概也和诗文作家相去不远，和汤显祖、曹雪芹相近的或许还不在少数。

三、关于本书的语言风格问题。我不想写得太干瘪、枯燥，有意寻求语言表述的“美化”，增加其可读性，于是就难免有散文般的随意，可能违背科研著作的严谨原则。不过预先已自律，力求在论据和观点之间印证，同时让条理清楚，章节分明，不出逻辑错误；还尽可能不重复使用同一条材料作为论据（事实上并未做到），使议论减少，让内容更具体生动，更丰富和充实。如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让读者产生不良反应，甚至有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疑惑，那么我只有恭敬地接受一切批评。

四、说明一下本书使用文献资料的情形：1. 有很多未注明版本，有很多地方未加注，我认为那是学人都知晓的基本典籍，作注反成蛇足。何谓“基本典籍”？我不清楚权威划分和界定的范围，所以只有凭感觉行事，自行认定。书中加注者，除了需要说明情况的之外，则是非基本典籍；有些基本典籍的引用采取括注。概括地说，本书的引用文献分为三种情形：不注的、括注的和脚注的。括注的是著作、文章题目，是只需要说明一下的内容；脚注的是必须详细说明的内容。书后所附“部分引用书目”，另一部分就是指所谓“基本典籍”，如十三经、二十四史、《全唐诗》、《全唐文》等。2. 为了查阅方便，本书并未排除对现时通行“选本”的征引，不一定斤斤于第一手资料，都引用古本、原本。但是，文献来源必须可靠，取舍主要是根据编选者的学识水平来确定。换句话说，这些选本经过实践检验，文献价值已经很突出。版本、文字已经过编选

者的考证、校勘，比较可靠。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等就是比较优秀的选本，本书多有引用和转引。3. 本书引用了《四库全书》中不少的典籍，其版本为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由于其书页码标注过于繁复，因此只注明卷数以便查阅。4. 某一种书籍多次引用时，只在首次引用时注明版本。5. 本书所引用的外国人著作，都有汉语译本，因此对作者都以汉语译文称呼，未标注外文。

目 录

绪论：“李杜优劣论”与文人相轻	(1)
一、现代的“李杜优劣论”	(1)
二、“李杜优劣论”导源于文人相轻	(3)
三、两派对峙下的诗歌创作	(14)
四、文人相轻与文学新变	(20)
第一章 文人相轻的理论回顾	(28)
一、“文人”的由来	(28)
二、对“文人相轻”的理性认识	(36)
第二章 文人相轻的思想渊源	(49)
一、道家思想的影响	(50)
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54)
三、其他思想的影响	(61)
四、思想溯源	(66)
第三章 文人相轻的心理基础	(70)
一、嫉妒心理	(70)
二、骄傲之性	(81)
三、戏谑之习	(98)
第四章 文人相轻的不同类型	(111)
一、学派的不同	(111)
二、审美趣味的不同	(120)
三、男女的不同	(133)
四、相貌和生理的差异	(147)

五、南北的分隔	(156)
第五章 文人相轻的表达方式与风格	(185)
一、诋毁	(185)
二、嘲讽	(193)
三、调侃	(198)
第六章 文人相轻与文学创作	(206)
一、对联创作	(207)
二、诗歌创作	(218)
三、文章和辞赋	(226)
第七章 文人相轻与文学评论	(231)
一、文人相轻与文学评论的关系	(231)
二、对文学评论的促进	(242)
三、论诗绝句	(254)
四、艺术欣赏	(261)
第八章 文人相轻的负面影响和积极意义	(267)
一、负面影响和局限	(267)
二、积极意义	(274)
部分引用书目	(288)

绪论：“李杜优劣论”与文人相轻

“李杜优劣论”为学人所熟知。此论从产生至今，时间跨度长，牵涉的人多，恰恰与本书讨论的内容和多个论点有关联。于是开宗明义，在夹叙夹议之中讨论这一题目，并在适当的地方点明与本书论说要点相关之处，为读者做一些提示。

一、现代的“李杜优劣论”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读书》杂志，2000年第3期载有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上）一文，上下古今，纵论汉语诗歌流变。作者将李白和杜甫两大诗人作了比较之后，先说李白是天才，又说：“接着杜甫出现了，他的机会建立在他之前的诗人的机会上：他是集大成者。集大成者出现之后，诗人开始变小……杜甫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我们不能说屈原、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他们只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某一方面……杜甫的伟大，是通过历代的无数灾难来证明的。而李白的伟大，是任何时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从读者的角度也可证实这点。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李白，跟在七十岁读李白，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但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杜甫，跟在三十七岁读杜甫，可能已有天壤之别。顺便一提，中国读者历来有‘李杜之争’，也即到底李白更伟大还是杜甫更伟大。这种争论将永远持续下去：既然民族精神不一定可以在一个时代全部被看到，那么一个民族诗人之伟大不能被一个时代中的某些读者以至大多数读者全部看到，又何足怪——杜甫的时代，就看不到杜甫的伟大。或许我们可以把

李白称为一‘伟’，把杜甫称为一‘大’：伟代表高，大代表宽。李白是塔，杜甫是平原，当我们在那座塔的一定距离内，例如十米至一公里，我们会被那座塔所吸引，而看不到这一范围内的平原或者看到但不当一回事。当我们与那座塔的距离越来越远，例如五公里、十公里，则我们将越来越被平原的气势所吸引。”作者的立意深远，比喻新奇，论说精彩，尤其是“中国历来有‘李杜之争’，也即到底李白更伟大还是杜甫更伟大。这种争论将永远持续下去……”的预言耐人寻味。

所谓“李杜之争”，就是“李杜优劣”之争的“李杜优劣论”。这已经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论题。从中唐开始，一直到现代都有人评说。略一回首，李杜之争波诡云谲，几十年前还掀起大波。1962年，郭沫若先生在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时说：“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可是仅仅过了十年，他却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把李白捧上天，把杜甫贬得几乎一无是处。时光又转悠了近三十年，还有人将平原一样博大的杜甫抬高到民族精神上观照，转瞬之间，博大的平原就高过了李白的高塔。这高和低的变化看似让人困惑，细想却很有道理。平原在我们脚下，而塔尖我们必须仰头才能看见，平原怎么会比塔高呢？困惑之后认真琢磨，作者的比喻既是文学的，又是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说，平原的确有高过高塔的时候。中国古代的塔，不管是七级浮图，还是镇山镇水镇妖镇怪的宝塔，其高度绝对没有超过一百米的。即使如今超过百米的现代建筑，也会在博大的平原的海拔变化之下相形见低。譬如辽阔广远、绵延千里的华北大平原，是完全可以高于塔的。如果李白是河南郑州附近的一座高塔，算它一百米，可是华北平原延伸向北，过了石家庄、保定，到了北京在望之时，平原依然是平原，但郑州那“李白塔”就变得低矮，因为郑州的海拔在一百米以下，北京的平原至少在三百米以上。如果再以立身在海拔更低处的高塔相比较，华北平原一类的平原优势就更明显了。由此可以

清楚意见：杜甫高于李白，也就是优于李白。这是新的“李杜优劣论”。

如果平原和塔都是仅供我们心中的影像所用，那么我们可以“熟视不睹泰山之形”，谁高谁低随我所欲。未来还会有平原和塔的比高么？李白那塔会不会有朝一日幻化成天上的北斗，高得让群星俯首，而杜甫的平原会不会萎缩成一个小小的沙丘呢？心中的影像自可因时代、因人而百变。百变的新论虽然难以预测，不过新论总离不了抑李扬杜或者抑杜扬李。抑李扬杜、抑杜扬李其实并非坏事，或许在抑扬变化的优劣比较中会带给文学以色彩和形象，带给文学评论以生气，给人们带来视觉冲击，直至刺激心灵的震撼。那么，总比老生常谈式的平稳、平板、平庸无创造的没精打采要好。

文学评论应是公允的、科学的。“李杜优劣论”是文人相轻，还是文学评论？如果是文学评论，那么它符合公允和科学的原则与标准吗？如果是文人相轻，它和文学评论有无关系？是怎样的关系？这是本书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

二、“李杜优劣论”导源于文人相轻

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 813 年），已经离开人世四十多年的杜甫的灵魂还在异乡漂泊。为了将其殡于洞庭湖边岳阳的尸骨迁回河南偃师的祖塋，他的孙子杜嗣业四处奔走。在完成此举的过程中，元稹写下了著名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墓系铭就是墓志铭。墓志铭这一类东西虽有秉笔直书之“史笔”，也有“谀墓”的曲笔，还可以借题发挥，挟带感情，推演开去说。于是元稹就将墓志铭写得很长，写着写着，就由杜甫牵出了李白，“李杜优劣论”就问世了：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

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①

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杜甫的诗歌吸纳了古代的一切优点，堪称完美和伟大，而李白与之相比却差得太远太远了。两年后，元稹的朋友白居易也旗帜鲜明地支持其言论。他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古今，颀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②

这就是导致从古至今争论不休，乃至将来也可能延续的最初的“李杜优劣论”材料。元、白是不是表达了瞧不起李白的感情倾向？是不是只为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而表达？元、白这样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意图？

李、杜下世才几十年，评论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令许多人惊讶。恐怕最惊讶的应该是九泉之下的杜甫。惊讶之一是生前穷愁潦倒，身后竟如此辉煌；惊讶之二是生前像追星逐月一样仰慕李白，无论从才华、能力，还是人格、风度各个方面，都景仰之至，甚至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就杜甫看来，李白的诗歌是唐诗中最优秀的，没有谁能超过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①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页66。

② 白居易：《与元九书》，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页97～98。